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地方精英与派系政治

——以1932年灵璧县抗烟捐暴动为例

张江波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从地方逻辑出发,以1932年安徽灵璧县抗烟捐暴动为例,可对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国家建设作出新的分析。清末北洋以来,灵璧县形成了“旧派”“雷派”和“新派”三足鼎立的县域权力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派逐渐控制了全县的党权、军权和财权,但在征税等一系列地方事务中,权力行使不断溢出边界,侵犯了民众利益。于是,在旧派的鼓动下,灵璧县烟农发起抗烟捐暴动,因县长王肖山应对果断,暴动很快平息。其后,新派暂时失势,旧派重新崛起,县域权力格局经历了重组。灵璧县的例子揭示出,对于县区级地方精英而言,无论是国民党党部抑或政府机关,皆成为了派系竞逐的资源 and 工具,国家则沦为“他者”,国家政权建设旁落,进而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关键词】地方精英;派系政治;灵璧;农民暴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3-0110-10

Local Elites and Fac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 Example of the 1932 Anti-Opium Tax Riot in Lingbi County

ZHANG Jiangbo

(College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logic, the 1932 anti-opium tax riot in Lingbi County,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an be used to make a new analysis of the modern state-building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ingbi had formed a three-pronged power structure of "conservative faction (旧派)", "Lei faction (雷派)" and "new faction (新派)".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new faction controlled the party power, military power and financial power of the county, but in a series of local affairs such as taxati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constantly overflowed the boundary and viola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o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Lingbi opium farmers initiated a riot against opium tax, due to the decisive response of the county governor Wang Xiaoshan, the riot was quickly quelled. Afterwards, the new faction temporarily lost its power,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re-emerged, and the power pattern of the county was reorganised. The example of Lingbi revealed that for the local elites at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levels, both the KMT and the governmental organs became the resources and tools for factional competition, while the state was reduced to the oth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fell by the wayside, thus weaken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KMT's rule.

Key words: local elites; factional politics; Lingbi; peasants' riots; modern state-building

[收稿日期] 2023-08-08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研编制计划重点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北地区权力形态研究(1927—1938)”(2022AH050028)

[作者简介] 张江波(1993—),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史。

引言

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权实现鼎革,整个政治结构开始从上至下进行重构。具体到地方社会,作为地域社会权力资源的支配者——地方精英,同样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各权力主体间的竞争日趋复杂且激烈。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揭示国民党政权的一些特质,而且能进一步检视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效度及其合法性问题。而1932年8月安徽省灵璧县爆发的一场抗烟捐暴动,便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微观切口。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灵璧发生暴动的一个月前,与之相邻的宿县也刚爆发过一场抗烟捐暴动,而灵璧正是受到了宿县的影响。两县暴动很快受到其时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时事》等诸多大报均有专门报道。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也高度重视两县暴动,由负责民运工作的“中央民运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专门派职员黄君禹前往调查。黄君禹进行了长达25天的实地调研,最终呈送了一份颇为翔实的调查报告^①。该报告不仅成为国民党中央处理暴动的重要依据,也为我们分析该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文献。

已有学者基于黄君禹的调查对两县暴动进行了初步研究^②。不过,前贤成果更多关注烟农与国民党当局,对于暴动中的地方精英则分析不多,关于灵璧县的这场暴动亦乏专论。具体到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议题,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经典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认为随着国家权力下移,以土豪劣绅为代表的“营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合法性,也未能实现国家权力的扩张^③。杜赞奇主要关注了村庄一级的精英,至于县区级精英则所述不多^④。而且,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国民党政权基本实现了对基层社会和地方精英的有效控制^⑤。所以,关于此论题仍有深入分析之必要。

本文将1932年灵璧县发生的这场暴动为切入点,具体考察地方精英在县域政治中的实践如何影响了国家政权建设。与宿县暴动最初发起于农民被迫反抗不同,灵璧县的暴动却是由该县的“旧派”鼓动,以反对当权的“新派”而起的。灵璧县的故事表明,对于县区级地方精英而言,所谓国家政权,无论是国民党党部或者政府机关,其实都成为了地方派系竞争的资源 and 手段,国家政权及社会公益建设旁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遭到了削弱。在地方社会,国家成为了“他者”,派系政治才是主词。

① 黄君禹:《调查后之感想及拟办各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04页。

② 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对两县暴动发生的原因及政府应对进行了梳理,朱移山与陈涛则以宿县为中心,探讨了国民政府现代化转型中乡村危机爆发的多种综合因素。参见毕仰高:《安徽宿县、灵璧(壁)县农民抗烟税斗争(1932)》,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2-203页;朱移山、陈涛:《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

③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1页。

④ 孔飞力(Philip Kuhn)在关于地方军事化的研究中,根据“名流”(elites,现多译为“精英”)“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将之划分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地方名流”。若按孔飞力的界定,本文所关注的精英显然都属于“地方名流”的那一层级。不过本文将参照孔飞力的划分,根据地方精英任职、影响的层级,进一步区分县区级地方精英和村庄精英的不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划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⑤ 王春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5-230页;杨吉安:《民国时期万载县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3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7-228页。

一、北洋时期灵璧的县域权力格局

灵璧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县境南北长、东西窄,呈长方形^①。据1935年统计,全县面积约2261平方公里,在全省62县中位列第14;人口约56万,居全省第15^②。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等,灵璧为二等县^③。县境北部有濉河横贯其间,湖田纵横,土壤肥沃;南部土地则相对贫瘠。农产以小麦、大豆、高粱为主。1929年11月,据一位安徽省督学的观察,“该县僻处一隅,风气闭塞”,尽管彼时风气稍开,“不过究竟显着穷的气象”^④。整体而言,灵璧是一个贫穷封闭的边缘县。

经济发展落后也影响了当地的民风习俗。梁启超曾说,皖北沿淮一带“自昔惟产英雄,不产学者。”^⑤朱一鶚也讲,“皖北风俗,贱商重农,尚武轻文”^⑥。灵璧县亦复如此。据黄君禹观察,灵璧民众“朴质而强悍”,由于近年来“受政治不良的影响”和“贪污土劣的剥削”,以致“人民穷困,多迫而为匪”^⑦。事实上,民众沦为为匪,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地生存资源有限,竞争性生存策略因此非常普遍^⑧。

民风彪悍导致该地兵多匪多,同样为武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在灵璧县,随着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办团而起的权力集团,中心人物是雷杰三(雷洪盛、雷汉民,1896—1950)。雷杰三来自灵璧县尹集区(今灵璧县尹集镇)小雷家村,出身于富裕地主家庭。据称,他自幼贪图安逸,系纨绔子弟,1913年投奔舅父马祥斌(时任安武军第一旅补充营营长),充入行伍,一路升至哨官。不过,由于雷杰三依仗舅父声势,在军中经常惹是生非,1918年即被马祥斌撵回了家中^⑨。

凭借殷实的家境、军旅生涯以及庇护关系网络,雷杰三的个人声望日隆。返乡后,他在尹集一带拉起一支声势强劲的武装队伍,1918年成为尹集团防局局长,1921年升任宿县警备营管带,不久改任灵璧县政府骑兵团团长,同时兼任张集、尹集联防自卫局局长,手握两个连的兵力。1923年,雷杰三的部队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雷只好再次投奔马祥斌,奉命招募了一支300余人、70余枪的部队,并被委以营长职。1927年,马祥斌遇难,雷杰三失去依靠后再度返回灵璧,任县警备营(又称“警备队”)营长。随着雷杰三在灵璧县办团、组织武装等各种军事活动的展开,围绕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雷派”的势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李慎吾和徐佛舟等^⑩。军权成为雷杰三崛起的主要权力基础。

与雷派不同,灵璧县的文教大权则主要掌握于另一支权力集团手中。尽管灵璧县的文教事业落后,但清末以来的学务革新,同样为当地士子提供了机遇。王奎璧(王灏,1885—1973)的经历便是一例。王奎璧1904年考中秀才,1905年考入安徽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新学教育,只是因倾向革命而被开除。之

① 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黄山书社,2019年,第1页。

② 数据来源:《本省各县人口密度与男女比例统计表(二十四年份)》,《安徽政务月刊》第29期,1937年6月,“统计”,第3—4页。

③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1935年,第B11页。

④ 董淮:《视察灵璧[璧]县教育报告书》,《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3卷第16期,1930年5月5日,“视察报告”,第28—29页。

⑤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第23页。

⑥ 朱一鶚:《皖北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7年,第5页。

⑦ 黄君禹:《调查皖北宿县灵璧[璧]县农民暴动报告书》(1932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00页。

⑧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19、58—75页。

⑨ 关于雷杰三的个人经历,详见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96—697页。

⑩ 黄君禹:《调查皖北宿县灵璧[璧]县农民暴动报告书》(1932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01页。李慎吾和李慎五为同一个人,史料有差别,特此说明。

后,他便在凤阳的一所私立小学做了一段时间教员,不久又成功考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因对革命热情不减,带头剪辮,还被学校记一次大过。毕业后返回灵璧,投身办学^①。

王奎璧为灵璧县学务发展贡献尤多。清末灵璧新学发展十分落后,据统计,1909年全县一共才有两所新式小学堂^②。1912年,王奎璧联络城内有志之士,创办了一所高级小学校及一所女子小学,并于该年年底被推选为县署主管教育的第三科科长。其后,他利用庙产等各种公产,一年之内在城里创办了4所小学,各乡也设立了20多所小学,使得当地新学发展突飞猛进。旧功名加上较高层次的新学教育,为王奎璧办学提供了学养基础,而办学则进一步提高了其个人声望,增强了其个人势力。他还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只是因对政党政治颇感失望,两年后就退党了。

不过,王奎璧在灵璧县教育界的地位也遇到了挑战。1913年11月,随着县制变更,王奎璧辞去了科长一职。次年,县里复设劝学所,但他未能任所长,只是在其后出任了县视学、县教育局会长,已不再统揽全县教育大权。后来,他虽两度出任县教育局局长,只是时间都很短。之所以如此,很有可能是当地教育场域争夺激烈的结果。如1924年的一篇报道即称,其时灵璧教育界“历起党争,甲是乙非,互相水火。”^③但无论如何,学识、声望以及办学经历,已使王奎璧成为了灵璧的权势人物,围绕他亦形成了一个权力集团,黄君禹在调查报告中称之为“旧派”^④。

旧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俊卿(1879—1935)同样颇值一提。李俊卿来自尤集(今灵璧县游集镇),出身富裕之家,清末就读于芜湖公学,1905年自费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当选为省参会议员。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遭到倪嗣冲通缉,被迫流寓省外,继续革命事业^⑤。尽管李俊卿常年在外,家庭、学识和革命经历,使他在灵璧县颇有影响。

大体而言,清末北洋以来的灵璧县域社会,形成了以雷杰三为首的雷派和以王奎璧为首的旧派两大派系分庭抗礼的格局。雷派把持军权,旧派手握文教权力,与行政当局共同控制着地方社会。双方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尽相同,雷派发家于清末以来的地方军事化,旧派则成长于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同的结构性断裂不仅为不同人群提供了机遇,也进一步形塑了地方社会的权力格局。

二、新派的崛起与抗烟捐暴动的发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结构性变迁对灵璧县的县域权力格局同样产生了很大冲击。作为革命型政党,国民党掌权后,也致力于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秩序。这为不同权力群体重新分配地域社会权力资源提供了新的契机,灵璧县的县域政治也更加复杂化。

随着政权鼎革,灵璧的国民党组织建立起来。1927年,国民党灵璧县临时执监委员会成立,1928年改组为国民党灵璧县指导委员会,田希孟、周孟斌、李翰卿任常务委员^⑥。政党政治的新发展,为各派势

① 关于王奎璧的介绍,除特别注释外,均参见《关于委任王灏充任师范讲习所所长等职务的委任令》(1917年1月26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号:L001-002-0212-012;《关于拨付灵璧县教育局卸任局长王奎璧任内亏垫学款问题的指令》(1936年1月8日),安徽省档案馆藏,档号:L001-002(2)-00067-007;宿志:《清末秀才王奎璧》,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宿州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0页;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99—700页;《灵璧县教育志》编写小组:《灵璧县教育志》,1984年,第21-23、228-230页。

② 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卷52《学科·普通》,黄山书社,2005年,第526页。

③ 《蚌埠教育实业界之杂讯》,天津《大公报》1924年3月9日,第3页。

④ 旧派的称呼更多是指该权力集团形成时间相对较早,而与其思想主张及政治倾向关联不大。

⑤ 名宜吉,俊卿系其字,其个人传记参见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86页。

⑥ 《中国国民党各特别市、省、特别党部整理党务概况》,出版信息不详,“安徽”,第7页;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102页。

力提供了发展自身的新机会。国民党竖起打倒土豪劣绅的大旗,向旧派发起了进攻,首当其冲的权势人物是王奎璧。1927年,县党部投书安徽省高等法院,控告王奎璧侵吞公款、妄图谋害国民党人等,王由此遭到通缉而避难于杭州^①。虽然关于该案的细节尚不清楚,但党部向王发难,背后应该有雷派的支持。灵璧县旧派的领袖人物就这样倒台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旧派和雷派之间泾渭分明,但各自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有所分化。特别是雷派,因权力争夺而走向了分裂。1930至1931年李葆楨任灵璧县县长期间,免去了雷杰三的县警备营营长职务,诸多雷派人物亦纷纷失势。雷派则施加报复,于1931年9月李葆楨离任途中,率众殴打了李,并抢夺了其财物^②。雷派失势,一方面和新县长李葆楨的治县之术有关,另一方面,据黄君禹的调查,还在于雷派内部的争斗。因为雷去职后,其属下李慎五取而代之,二人由此反目成仇。而且,围绕李慎五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派”的权力集团,周孟斌、李汉卿与张汝南等人是该派的代表人物(表1)。

表1 1932年前后灵璧县地方精英派系表

派系名称	主要代表	领袖人物
旧派	王奎璧 李俊卿 刘品清 吴幼彬	王奎璧
雷派	雷杰三 徐佛舟 王得志	雷杰三
新派	李慎五 周孟斌 李汉卿 张汝南	李慎五

资料来源:黄君禹:《调查皖北宿县灵璧[璧]县农民暴动报告书》(1932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01页。

雷派分裂之后,实力自然有所削弱,加之旧派式微,新派趁机不断发展壮大。到1932年,新派在灵璧县已如日中天。据黄君禹的报告,新派领袖人物李慎五取代雷杰三后,把持着全县警备队,手握全县军权。新派的代表人物李汉卿则充任警饷筹备处处长,警备队所需经费,自县城以至各区乡的征收,均由新派把持。周孟斌还是县财政局局长。灵璧共分为五个区,第五区区长张汝南、第四区区长马健民(或作“马建民”),均属于新派。

新派的势力还延伸到县国民党党部。新派的代表人物周孟斌,于1928年即开始充任县党部常务委员。至1932年,新派的李慎五兼县党部监察委员,李汉卿、周孟斌均兼执行委员。指导委员赵觉民也和新派关系密切^③。这表明,新派控制了国民党党部。如此一来,灵璧县的党权、兵权和财权悉数落于新派手中,旧派和雷派则相对旁落。虽然国民政府当局特别强调党、政分开,面对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国民党中央也多三令五申党不能干政^④。但在灵璧县,党、政乃至军实则彼此交融,国民党干部赵觉民还是县督学^⑤。

由于新派一家独大,在权力行使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轨行为,以致侵犯民众利益。据黄君禹讲,李汉卿在征收警饷时,民众稍有反抗,即施以严刑。警饷征收的次数、手续及用途等,也都任意为之。另据灵

① 王奎璧于1930年被判处无罪,他也结束客居生涯返回蚌埠。参见《清末秀才王奎璧》,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宿州卷》,第740页;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99-700页;《灵璧县教育志》编写小组:《灵璧县教育志》,第228-230页。

② 该案详情可参见《令灵璧县政府据该县李前县长呈报被雷杰三等抢劫殴辱情形并据李正学等电诉情形仰严拿雷杰三等分别解省法办由》,《安徽民政月刊》第33期,1931年10月,“公牍”,第9-11页;《为声讨雷杰三启示[事]》(约1946年),灵璧县档案馆藏,档号:071-111-011-005。

③ 《灵璧[璧]县民众代表田学敏等报告》(9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20页。

④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

⑤ 《灵璧县教育概况》,安徽省教育厅编:《一年来之安徽教育》乙编《教育概况之部》,1930年,“(二)地方教育概况”,第1页。

璧民众代表的控诉,新派还以借款的名义,强行勒索民财。如李汉卿挟警队武力,强行向全县各区农民借款,有案可查的就达11820元,私自收取的款项至少在六七千元。区长张汝南、马健民都有非法强行借款的行为^①。

不止如此,新派还巧立名目,用各种手段搜刮民脂民膏。1931年,江淮一带发生特大水灾,皖北地区受灾严重。据报道称,因淮河泛滥,“沿河各县,胥成泽国”“损失之大,受灾之深,为亘古所未有者也”^②。1932年,春荒严重^③。李慎五、张汝南便趁机组织了一个“备荒储蓄会”,两人分任正副主任^④,游桂儒(一作“游于儒”)为经理。他们通过武力强迫农民认股,每股50洋元。由于正值春荒,农民拿不出钱,即惨遭毒打或羁押,甚至有农民被逼死。李慎五等还发行了一万串纸币,强迫民众使用。乡民心怀愤恨,却敢怒不敢言。

手握灵璧县财权的新派,同样控制了全县鸦片烟苗税的征收。据黄君禹的调查,灵璧县烟苗种植面积与种植范围都不及宿县。灵璧县烟苗税^⑤合计5万余元,有账可查的只有2万余元,另有3万多元没有入账,上缴省政府的只有3000多元,其余都被贪污侵吞了^⑥。灵璧县民众代表在一份控文中也说,据不完全调查,该县第四、第五两区征收烟苗税2万余元,上级政府所收不过2000元左右,其余也都被区长张汝南、马健民等人中饱私囊了^⑦。不过,黄君禹也明确表示,灵璧县在征税过程中没有宿县严苛。

新派虽然在灵璧县炙手可热,但遭到冲击的旧派并不愿就此边缘化,后者也在等待时机,以重返县域政治的舞台中央。和王奎璧的境遇不同,旧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李俊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凭借老革命党的身份,得以谋得更多要职,如1929年曾充任兴化县长。只是李俊卿的仕途生涯不长,离职后潜居于南京^⑧。1932年7月,宿县抗烟捐暴动发生后,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诸多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据黄君禹讲,正旅居南京的李俊卿通过报章了解到宿县暴动后,便致函灵璧县尤集的小地主马焕卿,让马焕卿向第五区区长张汝南索还烟款,李俊卿则承诺在外援助。受此鼓动,马焕卿于8月2日率领百数十名农民,到区公所找张汝南算账。张汝南恼羞成怒,便请李慎五派警备队镇压^⑨。

当县警备队即将开来的消息传到尤集,乡民内心多惶恐不安。8月3日,农民越聚越多,达到四五千人。下午,警备队果然开到,只是担心民众太多,未敢贸然开枪。面对如此紧张局面,乡民已成骑虎之势,于是紧急推举田学敏为总指挥。田学敏曾在国民党第五师熊式辉部当过连长,深谙军事,且为人豪壮仗义,很有声望,所以民众推选了他。乡民还收缴了各乡的自卫枪支^⑩。灵璧县的暴动就这样爆发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也在暗中开展农民暴动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据时任中共睢宁县王集区区委书记王以夫(江苏睢宁人)后来回忆称,为了组织农民暴动,中共徐州特委(以下简称“特委”)在灵璧县北部多有活动。虽然特委发展了部分党员,也建立起了党组织,但由于本地人发动暴动有困难,加之力量

① 《灵璧[璧]县民众代表田学敏等报告》(9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19-620页。

② 《皖北奇灾》,《民国日报》1931年8月3日,第1张第4版。

③ 《皖北春荒惨状》,《时事新报》(晚报)1932年4月17日,第1版。

④ 《灵璧[璧]县备荒储蓄会股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21页。

⑤ 烟苗税的征收包括正税和捐税两项,烟农则多统称为烟捐或烟苗罚金,本文统称为烟苗税,同样保留烟农的说法。

⑥ 黄君禹:《调查皖北宿县灵璧[璧]县农民暴动报告书》(1932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01页。

⑦ 《灵璧[璧]县民众代表田学敏等报告》(9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19页。

⑧ 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86页。

⑨ 本文关于民变的经过,除特别注释外,均参见黄君禹的上引调查。

⑩ 《灵璧民变扩大》,《申报》1932年8月16日,第11版。

薄弱,特委又派王以夫等人到灵璧县帮助工作。1932年7月,王以夫等人抵达后,以尤集区李楼村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组织了1500余人枪。王以夫还讲,推选田学敏为总指挥及马焕卿向张汝南发难,背后都有中共活动。暴动发起后,王以夫即返回睢宁,由特委另派他人领导^①。

不过,虽然中共的前期组织可能推动了暴动的发生,但仍有待进一步考察。因为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在1932年8月17日的一份报告中,曾专门介绍了灵璧县发生的这场暴动。但关于王以夫在回忆录中介绍的暴动发生前的中共活动,巡视员的报告却丝毫没有提及。而且,在谈及暴动发生的原因时,巡视员的报告特别讲,是灵璧县第五区农民受宿县的影响,“自发暴动”,亦未提及是中共组织动员的结果^②。所以,王以夫等中共党员起初的活动,很可能并非专门为发起抗烟捐暴动而为,灵璧县暴动的发生恰好为中共活动提供了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提高农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暴动民众也曾主动寻求中共的领导。据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报告,暴动发起前,灵璧县第五区的一位民众代表^③来到临近的江苏省铜山县,找到正在郊外搞农民运动的灵璧籍中共党员李曜临,称他们村里有五百余群众,20里以外还有两千多民众要发起暴动。虽然下面的领导人都有了,但还缺一个“大头领”,所以“要求共产党去领导他们”。徐州特委于8月6日知悉了此事,虽然认为李曜临工作经验不足,且出身富农,但由于无他人可派,就派了李前去领导。李8月7日即出发前往,而8月5至6日,暴动即已开始^④。

民众代表主动联系中共来领导暴动,表明对于乡民而言,中共确是一支可兹依靠的力量。至于民众代表寻求中共支持的背后,是否有旧派的指使,即旧派是否企图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扳倒新派,由于史料所限,仍待进一步考察。但无论如何,中共在县域社会的影响已然不可小觑。地方派系竞逐的激化为中共革命提供了结构裂缝,而革命势力进入县域社会,也使得县域政治与地方权力格局更加复杂化。

随着暴动民众与政府武装展开激战,县警备队很快败退并仓皇而逃,愤怒的乡民开始向新派人物发起报复性攻击。农民军先是捣毁了备荒储蓄会经理游桂儒的商店,紧接着捣毁了李慎五、李汉卿、张汝南家,还分了他们的粮食。一份新闻报道称,乡民还封了张汝南家的杂货店,焚毁了其房屋^⑤。乡民提出了三点要求:(1)退还烟苗罚金;(2)严惩“土劣”李慎五、李汉卿、张汝南、游桂儒等,查抄其家产,用以赔偿民众损失;(3)对暴动民众概不追究。在暴动民众的冲击下,李慎五、李汉卿很快出逃,张汝南及很多富裕士绅亦纷纷逃至徐州。县党部指导委员赵觉民则奔走于南京、蚌埠之间,与旧派的李俊卿接洽,请其调停。

三、暴动的平息与县域权力格局的重组

灵璧县抗烟捐暴动发生之时,正值该县新旧县长交接之际。新县长王肖山7月29日接到委任^⑥,8

① 参见王以夫:《我所知道的灵北抗烟捐暴动》,灵璧县党史办公室编:《灵璧县党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44-45页;中共灵璧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灵璧历史 第一卷(1921—1949)》,黄山书社,2019年,第22-24页。

② 《省委巡视员巡视徐州工作报告》(1932年8月17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6年3月—1934年6月》,内部资料,1988年,第104-10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灵璧历史》称该代表是田学敏,并判定田学敏来的时间是8月6日。然时间可能有误,代表的身份待考。参见中共灵璧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灵璧历史 第一卷(1921—1949)》,第23页。

④ 《省委巡视员巡视徐州工作报告》(1932年8月17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6年3月—1934年6月》,第105-106页。

⑤ 《皖北灵璧民变平息》,《申报》1932年8月22日,第9版。

⑥ 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105页。

月11日履新,期间恰是暴动从发酵到沸腾之时。处理这场暴动成为新县长的第一个挑战。和宿县县长不同,王肖山尚未卷入到灵璧县的县域派系政治中,在烟税征收上也没有任何利益牵连,所以处理起这场暴动就没有太多阻碍与顾忌。履新后第二天,王县长即赶赴乡下。他不仅沿途劝慰民众,还应乡民所请,将第四区区长马健民等人撤职。8月19日下午,抵达尤集,和民变首领田学敏等人会商解决办法,允诺将第五区区长、团防局长张汝南撤职。20日晨,召集民众讲话,劝导抚慰乡民,数千名民众分别解散。21日,召集第四、五两区绅耆会议,商讨善后方案^①。

在王县长的努力下,暴动的最终处理结果为:(1)涉案的新派人物李慎五、李汉卿、张汝南等均被撤职惩办;(2)各区区长被撤销,各区团防局局长也被撤换;(3)各农户据实填写烟苗罚金,交由圩长呈报县政府,再由县里转请省民政厅设法退还;(4)参加暴动的乡民不受追究。可以说,王县长几乎满足了乡民全部诉求,这场暴动就此宣告平息。相较于宿县,灵璧县处理此次暴动更为成功。宿县第一次抗烟捐暴动发生后,新任县长章世嘉由于卷入了地方派系斗争,未能严惩涉案地方精英,对暴动领袖也没有做到既往不咎,因而造成了第二次暴动。但灵璧县县长王肖山则充分答应了民众要求,且没有食言。可见,县长的个人能力及策略性选择对地方治理的成效有重要影响。

县长王肖山之所以会答应民众要求,还在于他对农民抱有很大同情。如他在报告中说,警备队本来是为保卫地方而设,却孜孜于警饷区捐的横征暴敛,以致怨声载道。王肖山认为,暴动发生就是因为李汉卿、张汝南和游桂儒的“激迫”。也就是说,农民在鼓动下揭竿而起,和新派的剥削不无关系。王肖山还观察到引燃此次暴动的深层结构性因子,即贫富负担不均。他直言,灵璧县富裕的大地主,“为富多属不仁”。如高家楼圩的大地主有一百顷地,但分摊到其身上的捐税,竟然与只有20亩地的普通农户一样多。警饷、区捐、教育费等各项附加,均由穷苦农民承担,富裕大地主却能明目张胆地逃避。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乡民平时还能忍痛纳税,一旦收成不好,就不可避免地铤而走险了。

不过,县长王肖山却否认了中共参与暴动的说法。王肖山在给安徽省民政厅的报告中称,所谓有共产党活跃其中,其实是县警备队编造的谣言,原因在于警饷处经理李汉卿携款而逃后,警备队警饷无着,军心动摇。王县长的说法显然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他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可能在于其掌握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他不想放大此次暴动,从而使暴动能够尽快平息。也正是在王县长的处理下,中共的组织活动收效甚微,暴动也没有进一步扩大。

和王肖山不同,国民党高层对中共在暴动中的活动尤为关注。如国民党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李延年于8月13日发给蒋介石的报告,即称此次暴动“显有共产分子活动”,李延年也派驻一营兵力防备^②。蒋介石在发给国民党第二军军长兼蚌埠警备司令蒋鼎文等人的电文中说,根据相关报告,灵璧县聚集万余人,由共产党员李曜临领导,分成东西南北四军,每军编成24队,每队200余人,共有枪支四千余,打算兵分数路向外发展,双方在灵璧第四区正处于激战中。蒋介石令蒋鼎文查明,蒋鼎文则两次派人到灵璧县调查,还专门派兵到灵璧驻防^③。而在李曜临前往灵璧后,中共上下级之间的信息往来则中断了。据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报告称,李曜临前往灵璧县一周后,并未遵照原计划向徐州特委报告暴动情况,而关于暴动的相关信息,特委则是通过报纸得知的^④。

① 本段及以下数段关于县长王肖山的叙述,除特别注释外,均引自《灵璧[璧]县长王县长上省政府民政厅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16-619页。

② 《李延年电蒋中正宿县民变已平息而灵璧及宿萧边境又有藉民暴动事盘据灵璧境尤集王集等处并进占宿北古饶集且有共产分子已令独立旅派兵驻夹沟符离集以资镇摄》(1932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15-207。

③ 《灵璧[璧]县长王县长上省政府民政厅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18页。

④ 《省委巡视员巡视徐州工作报告》(1932年8月17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6年3月—1934年6月》,第106页。

由于宿县与灵璧的暴动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关注,后者也对涉案人进行了惩处。1932年10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召开常委谈话会,讨论了宿、灵农民暴动事宜,决定将黄君禹的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提交星期四常会讨论^①。11月3日,中常会讨论通过,将宿、灵暴动案中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县党委及党员,悉数开除党籍^②。其实,灵璧和宿县发生的农民暴动并非特例,彼时很多地方均发生了类似事件。1933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即坦言,“近查各地党员,每有自甘堕落,致与贪污土劣,朋比为奸”,甚至“勾结土劣剥削人民,引起暴动情事”^③。灵璧县的故事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考察国民党政权建设提供了一个切口。灵璧县抗烟捐暴动的发生原因复杂,既有贫富负担不均的结构性矛盾,还有“土豪劣绅”的横征暴敛。但暴动之所以能引燃,关键在于地方精英派系竞争的激化。

灵璧县抗烟捐暴动偃旗息鼓后,以李慎五为首的新派势力倒台,在县长王肖山的主导下,灵璧县域政治格局也开始重组。1933年2月,灵璧召开了全县行政会议,各方权势人物几乎悉数参加,从这次会议可一窥其时灵璧权力形态的基本面向。根据《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设县政会议,由县长、秘书及科长、各局局长组织,负责审议县预决算、发行公债、处置公产、经营管理各项公共事业等^④。从灵璧县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参会人员基本囊括了灵璧县被承认的各权势群体,包括县政府公职人员、士绅、法团领导、学校校长等,共43人^⑤。这显然比《县组织法》所规定的范围要广。

参加此次会议的多为灵璧本地人,但从参会人员的职务来看,政府机构多被外地人掌握。具体而言,所有参会人员中,灵璧本籍33人,外地10人。从县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籍贯来看,县长之外,秘书、两科、承审员、建设与户籍专员、教育局长等重要机构,均由外地人担任,只有公安科和财政局由本地人掌握。这表明,地方政府机构日益非本籍化,地方力量有所削弱。不过,尽管很多科、局由外地人负责,但若推行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自然还需要当地人的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加会议的43人中31人有明确职务,其他12位灵璧本地人却无任何职务。他们没有职务,却仍能参与到县行政会议中,说明他们是当地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头面人物。职务的“名”与权力的“实”之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雷派的代表人物徐佛舟没有任何职位,即参加了该会。他还负责民政组的审查,并作为代表进行了开幕演讲。徐佛舟说:“新政实施,各方意见未臻一致,去年不幸发生民变,声势汹汹,全境震骇”,县长“恐各方隔阂,为慎重施政起见”,召开此次行政会议。徐佛舟所言反映出县长为弥合各派势力的意愿和努力。

在参会人员名单中,没有看到新派代表人物的影子,而旧派的领袖人物王奎璧和李俊卿都参加了此次会议。王奎璧是以第一区区长的身分参会的,他还被选为教育组的审查委员之一,并担任召集人。据记载,1933年初,县长王肖山特别邀请王奎璧担任区长一职^⑥,后者也得以重返灵璧县域政治舞台。只不过,王奎璧仅干了几个月,到当年5月,随着王肖山离任,王奎璧也辞去了区长之职。李俊卿以旅京同乡会委员的身分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不在灵璧居住,在开会的第二天才从南京赶到会场,并以17票多数当选为会议副主席,主席则为县长王肖山^⑦。王奎璧和李俊卿如此受重视,既表明抗烟捐暴动后,随着

① 《中常委谈话会》,《申报》1932年11月1日,第4版。

② 《中常会决议案》,《申报》1932年11月4日,第4版。

③ 《中央党部诰诫各地党员》,《申报》1933年4月25日,第6版。

④ 《县组织法》,屈武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 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26页。

⑤ 本段及以下关于此次会议的分析,除特别注释外,均参见县政府:《灵璧县政府行政会议记录:会员一览表,开幕典礼记录、第二次、第三次会议记录,民政组提案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1933年2月),灵璧县档案馆藏,档号:071-111-002-001。

⑥ 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700页。

⑦ 据记载,李俊卿曾于1932年任灵璧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但至于其是暴动发生前还是之后任职的,尚待考察。参见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686页。

新派的倒台,旧派势力在灵璧重新崛起,也反映出县长王肖山对旧派的拉拢。

不过,新派的失势只是暂时的,他们并未就此在灵璧县的县域政治中消隐。抗战时期,新派领袖李慎五曾于1942年4月短暂担任过灵璧县代理县长。1945年灵璧成立临时参议会,周孟斌就任副议长,并于次年第二届临时参议会成立时升任议长。1947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李慎五任参议长^①。虽然新派内部也可能出现分化,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派的代表人物仍然左右着县域政治,在灵璧的地方权力格局中占据着关键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结 语

清末以来,学务革新、地方军事化及革命浪潮等一系列结构性断裂,不断冲击着地域社会,亦给地方精英带来了不小挑战。与之同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制度性变迁,也带来了诸多新机遇,形成了一些新的权力资源。由于这些资源相对有限,为了获取更多生存空间,地方精英在反复调试中既相互区隔,又互为奥援,不断经历着分化与重组,地域社会的政治生态由此更加复杂。灵璧县的故事即为考察清末以来多方势力交织下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与演变提供了一个微观切口。

在灵璧县,清末北洋以来逐渐形成了旧派、雷派及新派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县域社会派系竞逐日趋激化,最终引燃了1932年抗烟捐暴动。灵璧县的故事表明,国民党政权显然未能实现对县区级地方精英的有效控制,杜赞奇关于“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论述依然有一定合理性。不过,杜赞奇更侧重于勾勒村庄精英的递嬗关系,即所谓“盈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经纪”。灵璧的例子则说明,这一线性描述很难涵括地方精英彼此间的复杂分化,更未关照到地方精英围绕地方资源所展开的激烈竞逐及各方势力的动态消长,至于不同精英集团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很难用此方取代彼方的模式化语言笼统而论^②。

灵璧县的暴动也成为地方权力再分配的手段。事实上,从地方逻辑出发,对地方精英来说,国家权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所谓国家政权,无论是国民党党部或者政府机关,其实都成为了地方派系竞争的资源 and 手段。各方为此展开激烈争夺,甚至不惜鼓动民众暴动。正如县长王肖山所批评的那样,各派“平时各树一帜,互争私利,不顾公益,一切纷扰又皆若辈为之背景。”^③如此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让位于派系利益,社会及民众公益被忽视,无疑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灵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启道主编:《灵璧县志》,第104-105页。

② 如有学者指出,浙江瑞安并未出现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土豪劣绅,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缺失肇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榨取;安徽亳县的例子也表明,县域政治中各方势力的消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参见李发根:《近代乡村社会环境变迁的乡土叙事:浙南乡绅张桐的日常生活史考察》,《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张江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绅党与县域权力格局——以亳县为例》,《安徽史学》2023年第6期。

③ 《灵璧[璧]县长王县长上省政府民政厅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619页。